

明朝十九陵

明孝陵博物馆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明朝十九陵

明孝陵博物馆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朝十九陵 / 王鹏善主编; 明孝陵博物馆编. —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44-2670-4

I. 明... II. ①王...②明... III. 陵墓-中国-明代-画册 IV. K928.7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2165 号

出品人 顾华明
策 划 周海歌
责任编辑 毛晓剑
装帧设计 王 主 毛晓剑
责任校对 刁海裕
责任监印 吴蓉蓉 朱晓燕
英文翻译 王 毅 韩 冰

书 名 明朝十九陵
主 编 王鹏善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12
印 张 20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2670-4
定 价 380.00 元

营销部电话 025-83248515 83245159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13 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鹏善

副主编

余金保 李德仲

编 委

王鹏善 余金保 李德仲

周钰雯 邸金强 毛周林

高小华 李 斌 向阳鸣

梅 宁 王广勇

执行主编

周钰雯

执行副主编

向阳鸣

序



中国古代社会人们有着“视死如生”的理念,所以非常重视墓葬的修建,尤其是历代帝王一般都“预作寿陵”,自己在世时便倾全力营建其陵墓。如《吕氏春秋》所载,国王修建的“陵墓若都邑”,帝王的陵墓往往是按照其作为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都城而修建的,是体现王权或皇权至高无上的重要形式。这些帝王陵寝构建的是“理想”世界,其中既有现实生活的“折射”,又有对现实生活的“期盼”,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却也是我们复原、认识古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实物考古资料。经过千百年来风雨冲刷和人为破坏,许多帝王陵墓已经湮灭无闻,但也有许多留存至今,作为不可再生的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得到妥善周全的保护,吸引着世人探寻历史的目光。



明代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晚期的王朝,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制度之大成,在许多方面多所创新,这种创新在帝王陵墓制度上也有突出的体现。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包括地面陵园建筑、地下玄宫建筑以及附属的石像生、碑刻等物质层面的内容,与葬式、陵园布局、玄宫结构及其所反映的思想观念等精神层面的内容。就明代帝王陵寝制度而言,只有考察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轨迹,才能对其创新性和继承性有深入的理解。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和夏商两代帝王的陵墓,但其都是后世追怀圣王的纪念性建筑,并不一定是古代帝王真正的埋骨之处。迄今能够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年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帝王陵墓是位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西北岗一带的商代晚期的商王陵和商王族墓。《易·系辞传下》:“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藏)之中野,不封不树。”“不封”指没有封土,“不树”指不栽树木。这在殷周墓葬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得到了证实,商周时期可视为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起源期。

春秋至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形成期,重要标志是封土墓和陵园建筑“寝”的出现和推行。春秋晚期中原地区出现了封土很高的坟丘式墓葬。如《墨子·节葬下》所载,当时王公大臣“衣衾必多,丘垅必巨”,在今湖北江陵、河北易县、山东临淄、陕西咸阳、浙江绍兴等地都发现过一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巨大封土堆,它们分别是楚、燕、齐、秦、越等国的王陵所在。蔡邕《独断》云:“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是说秦始皇把“寝”从原来的宗庙中分割出来,造成了陵墓的边侧。但从现代的考古发现看,在墓地上设“寝”的礼俗可以追溯到商代,普遍实行则在战国秦汉之际。战国中期到西汉,把“寝”造到了陵墓顶上或边侧,根据当时的观念,是为了便于死者灵魂用作饮食起居的处所。把“庙”造到附近的陵园外边,则是便于死者灵魂到宗庙里接受祭祀的典礼,当时重要的祭祀典礼还是在“庙”中举行。

东汉时期,确立了中国古代陵寝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按清人徐乾学《读礼通考》所载,从东汉明帝开始,举行上陵朝拜和祭祀典礼,同时又废止了为每个祖先建立一“庙”的制度,把历代神主会集到一个祖庙(太庙)中,实行“同堂异室”的供奉办法。同时,为了适应举行规模很大的上陵礼的需要,扩大了陵寝的规模,在陵园内设立了寝殿或石殿,以及钟虞(钟架),用以挂行原来只有朝廷和宗庙行礼才用的大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处于衰退期。由于群雄割据,连年战乱,再加上北方少数民族部落入据中原,社会秩序紊乱,许多大墓常被盗掘,帝王陵寝更难保存,因此帝王不能不暂时放弃陵寝制度。如魏文帝鉴于“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从此废除陵寝,取消了上陵礼。晋代沿袭魏制,虽然东晋时期恢复了上陵的礼仪,但并没有恢复过去那样陵寝的规模。南朝陵墓大体沿袭东晋制度,依靠山麓、山腰建成,但引人注目的是其陵园朝向随山向背,而不像汉陵那样都有固定的方向。北方在十六国时期,为防止盗掘,少数部族沿用原来的风俗,多数采用“潜埋”方式而不起坟。隋文帝杨坚代北周自立,其“泰陵”以汉代皇陵制度为模本,兼采南北朝诸帝陵长处,陵寝制度开始向复杂、完备发展,但隋代三代而亡,其陵寝制度没有得到完全的发展。

唐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鼎盛时期,其陵寝制度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其陵园多是穿凿半山腰而成,封闭墓

室后形迹不显。同时,在陵前建献殿(即寝殿),在山下建寝宫(即下宫),适应了上陵朝拜祭祀和日常供奉饮食起居生活的需要,使其上陵朝拜典礼显得更加重要。五代十国时期,诸王朝多承汉唐之制,但规模远远逊色。宋代陵寝制度大体沿袭唐代,但比汉唐简易,皇帝死后才开始营建寿陵,只有七个月的期限,陵寝规模也比较小。

北宋陵园的主要建筑也和唐代一样,为上宫即唐代的献殿(寝殿)和下宫(寝宫)两所。南宋的皇帝只在绍兴选择陵园浅埋,“实居浅土,蔽以上宫”,准备将来收复失地后迁回祖宗陵园重建陵墓,在宋亡后遭到毁灭性破坏。辽、夏、金等三个与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各有自己的陵寝制度。三朝皇陵一方面吸收了唐、宋陵的某些制度,另一方面也保留了本民族的特征,如契丹式的葬法、西夏陵园中的陵塔等。元朝诸帝驾崩后采用蒙古族的潜埋的墓葬方式,明初叶子奇《草木子·杂制篇》讲到元代历代送终之礼说:“元朝官里,用槐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岂复有发掘暴露之患哉,诚旷古所无之典也!”其墓葬不封不树,地下无墓室玄宫,地表也不建陵园,可以认为元代不存在正规的陵寝制度。

明代对中国古代的陵寝制度作了重大改革,以鲜明的创新特色标志着中国古代陵寝制度走到了一个新的、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后的一个发展阶段。与前代帝王陵寝相比,明代帝王陵寝有很多方面的突出特征和创新之处:

第一,陵址选择方面。与汉、唐、宋等前代王朝不同,明代帝陵不是选在高旷的平地或因山为藏,而是卜穴于山前的慢坡处,其选择的标准则是托名晋代郭璞所著《葬书》所阐发的“风水”理论,讲究寻龙、察砂、观水、点穴的一套程序,以选择“藏风聚气”的风水宝地。唐代前风水堪輿之术对皇陵的影响并不明显。宋代建陵明确采用了风水之说,即流行的是“五音姓利”之说,即把姓氏分归五音(宫、商、角、徵、羽),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所利之地势首选东高西低、次选南高北低。因为我国总体地势是西高东低,赵姓所需的地势是很难找的,开封附近没有这种地势,结果北宋诸陵将陵址选在了远离国都的河南巩县。角音所利方向是壬、丙方向,壬地即北方偏西处,所以诸陵皆居于壬位,面朝南而略偏东,同时把下宫建造在神墙外陵墓的北方偏西处。明代孝陵陵址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率大臣踏勘选定的,明成祖长陵陵址的选择则有当时江西派风水理论的嫡传廖均卿及精通风水术的官员参加。明代列帝选陵除聘请著名的风水先生外,主要依靠钦天监选派的阴阳生,人员不足时以天文生充之。

第二,宝顶形制方面。封土即墓室之上的坟丘土冢,以土夯筑而成,是帝王陵寝的重要标识。战国秦汉至宋代,帝王陵墓封土平面大多是方形或长方形,上小下大,如覆斗状,多分成上下三层或二层。从明太祖孝陵开始,明清两代帝陵的封土改为圆形或椭圆形,并且以砖石环砌,称为“宝城”,封土的中心凸起部分称为“宝顶”。

第三,陵宫布局方面。陵宫的围墙从方形改为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分为三个院落,第一进院落除陵门外设碑亭、神厨、神库(或具服殿)。第二进院落除殿门外,设祭殿(或称享殿、祔恩殿)和两旁配殿。第三进院落设牌坊、石五供和方城明楼。方城后是宝顶,周围砌有砖壁,成为宝城。清代东陵、西陵都是依照明帝陵的格局建成,变化不大。明帝陵陵宫的整体结构是仿宗庙或皇宫的“前朝后寝”之制度,祔恩殿(享殿)像“朝”,明楼、宝顶像“寝”。

第四,祭祀制度方面。相对于前代,明帝陵取消了建在陵园之侧的寝宫(下宫),而以陵园中的明楼宝顶代之,同时取消了留居宫人日常饮食起居的办法。相应地,扩大了祭殿(称祔恩殿或享殿)即上宫的建筑,使其成为陵墓上唯一的祭祀场所。陵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有时其实际地位甚至超过了宗庙。

明代帝陵相对于汉、唐、宋虽然少有继承,对后世清代和民国的陵墓制度却有重大影响。除了在具体建制和平面布局、礼制等方面有一些明显差别外,清代皇陵制度基本仿自明陵。民国时期两位特殊人物的墓葬,河南安阳的袁世凯墓和江苏南京的中山陵,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明陵印记。

明代帝陵建成时代先后不一,陵寝制度上也有变化,大体说来,凤阳皇陵基本套用了宋代等前代制度,南京明孝陵创立了新的规制,北京长陵因之而小有改作,献陵之后各陵进入了定型守成期。其中还有特殊类型的陵园,如明孝陵东侧的东陵,葬的是朱元璋长子懿文太子朱标,后来朱标之子朱允炆登基,追谥朱标为兴宗,东陵也升格为帝陵。但朱棣夺取朱允炆皇位后又恢复东陵太子陵的名号,后世始终没有如制修缮,直到南明弘光(1645)时,才“追崇尊号,易黄瓦、改故殿”。又如湖北钟祥的明显陵,本是兴献王朱祐杭的王陵,后来其子朱厚熜入继大统为嘉靖皇帝后,才改建兴献王陵为帝陵。《明朝十九陵》的推出,让明代帝陵丰厚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得到形象生动的展示,让我们有机会对明代十九帝陵进行全面、细致的了解,这是值得庆贺的!

是为序!

龙金民

明史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目录

序	5
明朝帝陵一览表	10
明代帝陵的历史、科技和文化艺术	11
十九陵位置示意图	25
皇陵	27
祖陵	49
孝陵	69
东陵	123
十三陵总神道	129
十三陵·长陵	147
十三陵·献陵	155
十三陵·景陵	159
十三陵·裕陵	163
十三陵·茂陵	167
十三陵·泰陵	171
十三陵·康陵	175
十三陵·永陵	179
十三陵·昭陵	183
十三陵·定陵	191
十三陵·庆陵	199
十三陵·德陵	205
十三陵·思陵	209
景泰陵	213
显陵	217
后记	240

明朝帝陵一览表

陵名	皇帝	年号	庙号	谥号	在位时间	世系	享年	合葬皇后	始建时间	所在地
祖陵	朱百六		德祖	玄皇帝	后世追封	太祖高祖父	不详	胡氏	1386	江苏盱眙
	朱四九		懿祖	恒皇帝	后世追封	太祖曾祖父	不详	侯氏		
	朱初一		熙祖	裕皇帝	后世追封	太祖祖父	不详	王氏		
皇陵	朱世珍		仁祖	淳皇帝	后世追封	太祖父亲	64	陈氏	1369	安徽凤阳
孝陵	朱元璋	洪武	太祖	高皇帝	1368—1398		71	马氏	1376	江苏南京
东陵	朱标		兴宗	懿文	后世追封	太祖长子	38		1392	江苏南京
长陵	朱棣	永乐	成祖	文皇帝	1402—1424	太祖四子	65	徐氏	1409	北京昌平
献陵	朱高炽	洪熙	仁宗	昭皇帝	1424—1425	成祖长子	48	张氏	1425	北京昌平
景陵	朱瞻基	宣德	宣宗	章皇帝	1425—1435	仁宗长子	37	孙氏	1435	北京昌平
裕陵	朱祁镇	正统	英宗	睿皇帝	1435—1449	宣宗长子	38	钱氏	1464	北京昌平
		天顺			1457—1464			周氏		
茂陵	朱见深	成化	宪宗	纯皇帝	1464—1487	英宗长子	41	王氏	1487	北京昌平
								纪氏		
								邵氏		
泰陵	朱祐棤	弘治	孝宗	敬皇帝	1487—1505	宪宗三子	36	张氏	1505	北京昌平
康陵	朱厚照	正德	武宗	毅皇帝	1505—1521	孝宗长子	31	夏氏	1521	北京昌平
永陵	朱厚熜	嘉靖	世宗	肃皇帝	1521—1566	宪宗孙	60	陈氏	1536	北京昌平
								方氏		
								杜氏		
昭陵	朱载堉	隆庆	穆宗	庄皇帝	1566—1572	世宗三子	36	李氏	1572	北京昌平
								陈氏		
								李氏		
定陵	朱翊钧	万历	神宗	显皇帝	1572—1620	穆宗三子	58	王氏	1584	北京昌平
								王氏		
庆陵	朱常洛	泰昌	光宗	贞皇帝	1620 年	神宗长子	39	郭氏	1621	北京昌平
								王氏		
								刘氏		
德陵	朱由校	天启	熹宗	哲皇帝	1620—1627	光宗长子	23	张氏	1627	北京昌平
思陵	朱由检	崇祯	思宗	愍皇帝	1627—1644	光宗五子	35	周氏	1644	北京昌平
景泰陵	朱祁钰	景泰	代宗	景皇帝	1449—1457	宣宗次子	30	汪氏	1457	北京金山
显陵	朱祐杭		睿宗	献皇帝	后世追封	世宗父亲	44	蒋氏	1527	湖北钟祥



明代陵墓建筑被视为礼制的重要载体,强烈凸现等级森严、尊卑有别的特色,并竭力追求和刻意彰显“思慕”精神。在这种取向下,帝王陵寝往往以宫殿建筑为原型,作为国家最重大的工程而不遗余力地经营,形成气势恢弘而又庄严肃穆的大规模建筑组群。其建筑艺术追求“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讲究人文建筑与山水地貌的有机结合,从选址规划到设计营造,依风水理论缜密进行,力图使陵墓环境氛围在建造人文美与自然美的和谐交融和相互辉映中,显现出生生不息和永恒伟大。

2000年和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先后将明显陵、明孝陵(明东陵附属在申报文本内)、明十三陵等明清皇家陵寝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做出这样的评语:“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百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明代帝王陵墓以自身固有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赢得世界最权威组织的青睐。

一、明代陵墓的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陵墓建筑数千年延绵不辍的发展,形成了文化内涵深厚、造诣精湛的独特艺术风格。在这一进程中,明代陵墓建筑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传统,既在礼制上形成了时代特色鲜明的严整体系,如“前朝后寝”;也在建筑形制上奠定了中国帝陵制度的终极模式,如“前方后圆”;尤其是大规模建筑组群同山水形胜结合的艺术创作上,取得了非凡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存,直接影响到清代陵墓建筑的发展。

明太祖朱元璋于建国初期首开礼、乐二局,推行“孝治天下”,大力整饬丧葬礼仪,以“稽古创制”,构建等级森严的陵墓建筑制度,将皇帝、皇族、职官以及庶民等各社会阶层的陵墓建筑规制,纳为国家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后嗣皇帝进一步调整充实,最终形成严整的陵墓建筑制度体系。这一体系中,皇帝陵寝居于至尊地位,皇后则祔葬其中,即最高等级的陵寝只有帝陵而没有独立的后陵。按照“历代诸陵皆有名号”的传统,各帝陵都要专门荐名,待帝、后安葬时正式命名。如《明太祖实

录》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庚午,孝慈皇后灵柩发引,“是晚仍遣醴饌告谢于钟山之神,以复土故也。命所葬山陵曰孝陵”。

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到明思宗朱由检亡明的277年间,明代(1368—1644)共有16朝在位皇帝:太祖朱元璋、惠帝朱允炆、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樞、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载堉、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除明惠帝朱允炆在“靖难之役”失踪而没有陵寝,其他皇帝都分别建有陵寝与皇后合葬。此外,朱元璋为父母和三代祖追封帝后尊号,营建了皇陵和祖陵;明惠帝朱允炆称帝后,依制追尊父母为帝后,使其父朱标的东陵具备了明代帝陵的文化地位;明世宗朱厚熜由藩王继统后,也追尊父母为帝后并改建原有王坟为显陵。这样,明代实际共建有十九座帝陵,分布在安徽凤阳、江苏盱眙、南京、北京、湖北钟祥等地。其中北京昌平天寿山群峰下荟萃了以明成祖长陵为首的十三座帝陵,统称明十三陵,继承了宋代陵寝聚汇同一兆域的传统,成为历史上最宏大的陵寝建筑群,呈现为明代帝陵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明代帝陵建筑制度历经沿革形成四种类型。一是初始型,为皇陵和祖陵,主要参照宋代陵寝制度而略有变革;二是创制型,为孝陵和长陵,继承前代陵寝制度要素而鼎力更新,创立明代特有的规制并成为后世各帝陵的基本范型;三是逊制型,包括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以及显陵等绝大多数帝陵,效仿孝陵和长陵制度却又不同程度地缩减规模以“逊避祖陵”;四是特例型,为景泰陵、思陵以及尚存争议的东陵,它们或由亲王坟和贵妃坟改建形成,或原为皇太子陵建制,在形制上与典型的明代帝陵存在某些特别之处,实际是最简陋的明代帝陵。

12 初始型中,皇陵为明代最早建置之帝陵。皇陵的鼎建,显现出明代陵寝初创的特征。一方面,同明初整饬礼制、力图恢复唐宋传统的

治国方略直接关联,皇陵建设曾有意识参照唐宋帝陵制度而“稽古创制”。皇陵外土城和砖城呈城门四出的方形平面,中轴线上石像生配置虎、羊、马与马官、宫人,陵台作覆斗式等,都明显效仿北宋帝陵建筑制度;而皇陵建筑组群依循中轴线有序布置,则参酌了南宋帝陵把北宋时分离的上宫和下宫串联在同一轴线上的格局;棂星门、神厨、神库以及具服殿等建筑的建置和命名,也都出自南宋帝陵下宫中相应的建筑。另一方面,皇陵建设同明初陵寝祭祀礼仪的改革相应,除在陵台举行“负土盖陵”的负土礼或上陵礼外,将唐宋陵寝分别在上宫的献殿和下宫的寝宫展祭的礼仪,大多合并在皇堂内进行,相关建筑也因此合并或调整配置。为了强化陵寝作为礼制性纪念建筑的空间氛围,从整体规划到局部形制,皇陵也都有相应改革。像附会《周礼》“天子五门”制度,在中轴线上有序布置的正红门、棂星门、红门、金门、后红门等五门,就是典型。这样的“稽古创制”,使皇陵的建筑组群形成了独特的格局:为祭祀活动服务的各类辅助建筑布置在外土城和砖城之间,构成了陵寝的辅助空间;在砖城和皇城之间,象征朝会议仗的神道石像生以及碑亭等,组成了谒陵展祭的引导空间;皇城内按照前朝后寝格局布置的皇堂,后红门迤南覆盖地宫的陵台,作为陵寝的主体建筑,成为举行祭祀礼仪的祭祀空间。

皇陵的建筑制度,在此后建造祖陵时曾被效仿。按万历朝《帝乡纪略》记载,祖陵规制参照皇陵,依套方之格局建置外罗城、砖城和皇城,砖城亦为城门四出。皇陵和祖陵的“稽古创制”,反映了明初陵墓建筑体系草创时期继往开来的艺术探索取向。

创制型中,孝陵是中国帝王陵寝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帝陵发展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自此以后近600年,帝王陵寝基本上都是模仿孝陵的格局营建的。孝陵对前朝帝陵制度作重大改革,主要创制为:其一,墓冢封土由前朝的覆斗式方形改为圆形圆丘,即采用宝城宝顶形式,并配置方城明楼。圆丘建制

最初出现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前蜀永陵，但作为帝陵定制并为后世所模仿，则始自明代的孝陵。其二，废除原始迷信的日常供奉制度，取消前朝帝陵中供皇帝灵魂起居的下宫，同时突出朝拜祭祀，保留和扩展供拜谒祭奠的上宫，形成一组以享殿为中心的祭祀建筑群。其三，摒弃原来以墓冢为中心的方形格局，改为在宝顶前设置长方形多进院落的祭祀建筑区，将享殿前门——享殿——祭台——方城明楼等地面建筑串联在宝城南面的中轴线上，使祭祀建筑区成为整个陵区的主体。其四，发展陵园前区的导引建筑 and 神道设施，在纵深约 3000 米的神道沿途，设置大金门、神功圣德碑亭、石像生、棂星门等众多的建筑和石雕，营造出庄严肃穆的纪念气氛，强化了帝王陵寝总体格局上的建筑艺术性。

结合山水形势规划布局，是孝陵区别于前代陵寝的显著特色。其中，作为前区引导空间重要构成的石像生群，依循呈“之”形环绕孙陵岗（今梅花山）的神道分成前后两段配置，既不同于唐宋陵寝前的直线排列方式，也区别于皇陵沿中轴线布置在砖城与皇城之间的格局。孝陵神道蜿蜒曲折、不拘一格的设计，一般认为是法地，或以为是象天。无论是法地还是象天，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

孝陵后区的院落化布局，使陵宫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和空间联系更趋密切也更臻合理；而且同前区对比呼应，在组织程序上通过结合地势布置的中轴线，把陵寝建筑组群布局中的引导空间、辅助空间、祭祀空间同山水胜景有机联系起来，疏密有间，错落有致，尊卑有序，以丰富而生动的空间序列，层层递进，明晰有力地展现出陵寝的礼制性纪念氛围和意义，突出陵宫主体建筑和陵寝核心的至尊地位。

此后，孝陵建筑规制被尊奉为长陵建筑的先范，其他各帝陵又承袭长陵制度而趋向定型。这样，孝陵的革故鼎新导致了明代帝陵建筑制度的重大转折，开创了一代新风。

朱元璋经营皇陵、孝陵分别同当年中都、南京的建设规划有着直接的关联，朱棣选择北京昌平天寿山营造长陵，也是将它作为京师的重要组成来实施的。嗣后，长陵被荟萃天寿山群峰下的其他十二座帝陵尊为祖陵，成为明十三陵的主体，体制完备而规模宏大。长陵建设“悉遵洪武俭制”，总体布局分为前后两区，陵寝前区配置牌坊、红门、碑亭、望柱、石像生、棂星门的空间序列，后区陵宫的三进院落配置陵门、祔恩门、祔恩殿、陵寝门、方城明楼和宝城等程序组织，其建筑形制和规模都同孝陵相应一致。

长陵建设在效仿孝陵规制的同时，也进行了局部性的调整，导致两座陵寝的一些重要差异，反映了明代初期帝陵建筑制度与建筑艺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一，南端神道起点的石碑坊改为五间六柱十一楼式样，朝向正对天寿山主峰，体现出陵寝整体创作意象上“陵制当于山水相称”的规划设计思想。其二，大红门前神道两旁添建了对峙而下的下马碑，映衬出从龙山、虎山之间拔地而起的大红门的雄浑气势，使陵区入口的空间氛围更臻庄严。其三，神功圣德碑亭四隅添建石雕华表，质地洁白，雕饰精美，造型轻灵，充满向上的动势，在空间感受效果上有力扩张了碑亭的心理体量。其四，神道望柱改移在整个石像生前端，赋予引导标志的性质，增强了仪仗队列的整体连续性，具有唐宋帝陵的意韵。其五，陵宫第一进院落内，东设五间神库，西设五间神厨，而将宰牲亭、具服殿移至门外东西两隅，各自围合成独立院落，使陵宫第一进院落的功能和空间布局更臻利落。其六，陵宫第三进院落加宽到和前两院相同，取消了方城两侧的八字影壁墙，使陵宫平面构成更臻严整统一，祭拜场所更显宏大。其七，方城和明楼改成正方形平面，面宽仅及孝陵一半而将主体大部朝南凸出，加上前庭添设的石五供和二柱门的烘托，形成雄浑的整体气势，显现出更臻庄严崇宏的空间氛围。其八，方城和宝城宝顶连成整体，未置孝陵那样的哑巴院，宝城稍小于孝陵，城顶墁砖为马道，内侧环砌宇墙并

设有宽大的砖砌排水明沟环绕宝顶。

长陵完善了孝陵开创的陵寝建筑制度,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此后,明代其他帝陵大多选址建造在长陵左右,并“逊避祖陵”而缩减建筑规模,使长陵的宏大规模和完备体制更强烈地凸显出来。

逊制型中,除了显陵地处异域,其余帝陵都伴随长陵荟萃在天寿山群峰下,整体意象上明显继承宋代陵寝聚汇同一兆域的历史传统。与孝陵、长陵不同的是,天寿山下这群“逊避祖陵”的帝陵虽然各有自成一体的陵宫建筑群,却没有各自独立的神道设施,谒陵展祭都要“统于长陵”而经由长陵前区的神道,其沿途石碑坊、下马碑、大红门、华表、石像生群及棂星门等导引设施实际属于共用配置。这一布局既突出了长陵作为“祖陵”的主体地位,也强化了各陵的整体联系,形成历史上最宏大的陵寝建筑群,显现为明代帝陵建筑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到嘉靖朝以后,这些帝陵祔恩门前的神道上都分别添建功德碑和碑亭,但尺度只及孝陵和长陵碑亭的一半,且都没有镌刻碑文。至于陵宫建筑,只有永陵和定陵“量仿长陵之规”,沿着陵寝中轴线纵向建置三进院落,相应建筑序列也大体类似长陵。这两座陵寝由明代享祚最久的两位皇帝——世宗朱厚熜(在位45年)和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生前倾力经营,构建豪华精致超出长陵。如《昌平州志》载,永陵“享殿、明楼,皆以文石为砌,壮丽精致,长陵不及”。永陵明楼的额枋、斗拱等均系石结构,地面铺文石,光滑如蜡,坚硬似钢;宝城和方城垛口都是花斑石砌筑,精美非凡。定陵则是仿永陵修建的,其宏伟壮丽不下于永陵。按《帝陵图说》记载,定陵外罗城甚至“左右长垣琢为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龟蛇之状,莫不宛然逼真,巧夺天工。”如此等等,都是明代陵寝中所仅见的。

在尊奉长陵制度的同时,缩减规模以“逊避祖陵,节省财力”,毕竟成为明代帝陵建筑制度嬗递的基本取向,永陵和定陵也难违例。如

殿、须弥座、配殿,到方城、宝城,规模各有缩减。其他帝陵的陵宫建筑“避尊节财”的意向更加突出,三进院落缩减为两进,直接以祔恩门作为陵宫入口,院内建筑配置基本格局虽然祖述长陵,形制与尺度却大都显著缩减。其后的宝城、宝顶不仅规模缩小,也没有沿用孝陵和长陵的圆形平面,而是呈现窄长程度不同的椭圆形。这是诸陵在“避尊节财”的同时,注重“陵制当与山水相称”即陵园建筑同山水形胜有机协调的结果。更典型的如献陵和庆陵,将陵宫两进院落分离建在龙砂前后,两院原本就有主从不同的尊卑等级和相对独立性,如此一前一后,在空间意象上分别具有唐宋陵寝上官和下官的性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避尊节财”显著的帝陵,都是其皇帝死后由后人建造或改建的。

特例型中,景泰帝陵由亲王坟改建而成,当年以王礼葬代宗于北京金山,地面未建多少园寝建筑。成化年间增建了享殿、神厨、神库、省牲亭、祠祭署、内官房、碑亭等建筑,嘉靖年间又改建碑亭并将园寝建筑绿瓦换为黄瓦,但终究未按帝陵规制增建宝城和明楼。

作为明朝终结的标志,思陵是天寿山下最后也是最简陋的一座帝陵,由思宗的皇贵妃坟园改建而成,且为清朝廷一手操办。清朝入关后,下令按帝礼为思宗举行改葬仪式,并营建地面建筑。园寝建有两进院落,内设享殿、配殿、碑亭、石供器等,石雕碑座由以往的龟趺改为方座式样,四面精雕瑞兽图案,碑帽为龙首式样,蟠龙由6条减为4条。顺治后期又在石供器前增建一座碑亭。乾隆年间,清高宗特命“重为修葺,悉如别陵”。思陵享殿由面阔三间扩建为五间,墓冢周围的墙体加砌垛墙,冢前增筑城台,并将石供器前的碑亭和墓碑移至新建的城台上,作为明楼设置。这样,思陵的建筑配置最终趋近了逊制型的明陵,但在原来贵妃坟园格局的限制下,规模仍然狭小。

东陵作为明代帝陵的提出,是伴随着上个世纪末东陵遗址考古报告而传播的。从总体布局上看,东陵大致采用孝陵制度,但在规模

上和建筑内涵上相应缩减。如中轴线上的主体要素寝园大门、享殿前门、享殿、宝顶均有设置,据史料记载,东陵尚有具服殿、神厨等建筑。考古显示的方城明楼的缺位以及所覆琉璃瓦呈绿、黄两色,说明当年东陵仍是一座皇太子陵的建制,这与建文帝在位时未能及时改建和扩建其父陵寝有关。但从其历史地位全面考虑而言,将东陵纳入明代帝陵范畴有相当的合理性。

建文帝登基后,追尊皇考朱标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母常氏为孝康皇后。按明代制度,儿子称帝,其父陵寝应获帝陵称号,但东陵“所荐陵号不传”(王焕镛《明孝陵志》)。从所传的祭祀礼制看,东陵一年凡九大祭,年法定祭祀次数是明代帝陵中最多的,祭文亦填写嗣皇帝御名,一如祭祀诸帝。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占南京,夺得帝位,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对朱标诸子及建文帝后代残酷迫害,几近灭绝。同时废建文帝号和朱标的帝号、庙号,恢复朱标陵为懿文太子陵的称号,试图抹去建文帝主政时期的所有痕迹。朱棣死后,正德、万历、崇祯年间,不断有大臣提出要恢复建文帝的历史地位。南明时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弘光小朝廷,短暂恢复了朱标夫妇的帝号和皇后号。清乾隆元年(1736),弘历帝召集群臣廷议,决定尊重历史为建文帝上谥号,称恭闵惠皇帝,这实际上也恢复了建文帝之父朱标应有的历史地位。所以,在乾隆年修定《明史》时,书中专门为朱标立《兴宗孝康皇帝传》,并附孝康皇后和建文生母吕太后传。从明到清,朱标先后三次获得帝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东陵应当具备明代帝陵的文化地位。

二、明代陵墓的科技价值

陵寝建筑为中国古建筑中一个重要部分,历代帝王陵寝形制受当时社会思想、国力强弱、营建技术的影响迭有演变。周代以前多建地下木椁大墓,地面不树不封;秦代中央集权,皇陵出现高大封土,奠

定了帝王陵寝的总体格局;汉袭秦制,却因砖石建筑技术发展,大量使用砖石结构;唐代国力强盛,盛行厚葬,墓葬追求高敞,帝王多以山为陵;宋代与辽、金、西夏长期征战,国势日衰,帝陵相形简朴;到了明代,强化礼制,陵墓凸现强烈的等级差别,帝陵多仿宫殿形式营建。像康熙初《江宁府志》提到朱元璋的孝陵“宝城、明楼、御桥、孝陵殿、廊台、墀道、戟门、文武方门、大殿门、左右方门、御河桥、棂星门、华表,多同大内制”,就强调孝陵建筑多以南京皇宫为原型。

营建帝王陵寝属皇室大事,朝廷往往不惜糜费大量人力财力精心构筑。因此建筑规模巨大,结构坚固,造型宏丽。而且古代宗法制度深刻影响建筑创作,故陵寝建筑无论形制、材料、装修、纹饰、色彩等,往往使用最高等级,极为隆重。如朱棣的长陵,那座祖述孝陵享殿而设置的祫恩殿,就与北京紫禁城皇极殿、太庙享殿类似:造型端庄,体量巨大,气势恢弘,面宽九间达 66.56 米,进深五间达 29.12 米,柱梁斗拱采用名贵金丝楠木,黄琉璃重檐庑殿顶,三重石雕须弥座大台基绕以望柱栏楯,前后踏跺安设石雕丹陛等。从建筑体量到制作工艺都是最高级的形制和做法,其中 32 根重檐金柱高达 12.58 米,全是合围 3 米以上的整根金丝楠木,更为举世罕见。

这种奇材佳木多产于四川、湖广、云贵、江西等地的深山密林之中,数百年才能长成。入山采木极其艰苦,大木采下后,难以运出山外,须待雨季山洪暴发,借助水力,方可将木材冲出深山。然后编成木排沿长江、运河北上。可以说,利用水力资源,是当年运输建材常用的科技手段。再如,建造帝陵需大量使用石材,诸如石像生、神功圣德碑、龟趺、五供祭台等都系采用巨型整石雕刻而成,重达数十吨。至于筑路、建桥、砌筑台基、建造地宫等所用石料更是不计其数。不论南京或是北京,明代帝陵所用石料多采自周边郊县。数十吨的巨石从产地运到陵区全靠人工畜力,还要事先修桥铺路,沿途打井,到冬季在路上泼水成冰,再顺冰道将石料拉到工地;夏季则在路上铺麦秸。每天

行程多则几里,遇洼地沟坡一天只能前进几丈。北京长陵神功圣德碑所用石料采自房山,长3丈,宽1丈,厚5尺,调用民夫两万人,历时28天才运到陵区,耗银竟达11万两。

如此巨大的石碑运到陵地,在当时无起重机械的条件下,如何将其放置龟背,史料并无记载,民间却流传着“龟不见碑”的故事。相传孝陵建碑时,因龟跌高大(高2.08米,宽2.54米,长5.15米),石碑(高6.70米,宽2.26米,厚0.80米)难以就位,主管此项工程的匠师为此卧立不安。一日梦见神仙对己说“想立此碑必须使龟不见碑”。醒后恍然大悟,命人取土将龟跌填埋,然后顺土坡将石碑徐徐拉上,待碑立起就位后再将土挖去。这个故事与埃及建造金字塔的传说异曲同工,实际上是古代匠师聪明智慧的写照。

在建筑工艺方面,明代陵墓在材料的使用以及建筑形式和内容的结合等方面,都取得较好的效果。就陵墓总体建筑来说,石牌坊、陵门、碑亭、石像生、棂星门、享殿前门、享殿、方城、明楼、宝城、地宫,是帝陵的主要建筑,都建造得坚固结实。为防备水火威胁,陵门、碑亭、方城均用石造须弥座做基础,墙身以巨石或巨砖砌筑。如孝陵大金门,下部为高1.60米的石造须弥座,上部为高4.91米的巨砖墙体,挑檐也为石造,檐椽用琉璃制作。木结构转换成砖石结构使用于建筑上,早在汉唐时期就已出现。但是,明初在南京宫城和陵墓的建造中,使用石造须弥座做整个建筑的台基,特别是用砖石起券建造无梁(量)殿一类大型殿堂建筑,这是明代建筑技术上的新创造。孝陵建筑中运用上述方法建造的几座建筑物,都发展了坚固、厚重、庄严、雄伟的传统,而且手法简炼,给人一种朴素、庄重的感觉。至于孝陵享殿,为突出它的祭享地位、便于装饰而大量使用了名贵木材,它的台基却是规模宏大的三层石造须弥座(底层面宽69.87米,进深50.80米;中层面宽64.67米,进深45.50米;上层面宽59.27米,进深40.26米;通高3.03米)。

帝王陵寝封土形成及其发展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战国、秦、汉和北宋时期的“方上”;唐代的“因山为陵”;明、清时期的“宝城宝顶”。明代帝陵将封土形式演变成具有艺术性的宝城宝顶,其中也蕴藏着丰富的科技含量。所谓宝城,即为在地宫上面用砖砌筑圆形或长圆形城墙;宝城以内堆土成冢,高度超过宝城者为宝顶。明代早期的宝城直径甚大,如孝陵直径达400米,长陵直径达340米。宝城前端筑有方形城台,称为方城;方城上建有碑楼,称为明楼,楼内立有皇帝谥号石碑。这种宝城、宝顶、方城、明楼结合在一起的形制,不仅使陵墓建筑拥有很高的艺术性,而且加强“陵”与“寝”两大部分的有机结合,使方城明楼成为陵寝建筑序列中的最高潮。更为合理的是,将墓冢封土由方上改为圆形的宝顶宝城,有利于山洪雨水排泄,方便于作为宝顶基础的宝城防止雨水浸润墓脚,这一形制对于多雨的南方帝陵尤为获益。

融科学性 with 艺术性为一体的排水系统是明代帝陵的匠心设计。以孝陵为例,江南雨水充沛,为防止水患,孝陵以外御河、内御河和宝城御河三条河流为主干,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它的难能之处在于,这套排水体系没有破坏陵域内不同建筑组合在空间上的有序性和完整性。在孝陵郭城内神道延伸线上和陵宫区域内,充分考虑到天然排水系统与建筑的空间组合关系,实施以三条河流为界,构成四片建筑群区,通过三条御河上的三组拱桥相衔接,连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做到既利用原有的天然河道,又将其巧妙地融入陵区布局设计中,并辅以江南传统的桥梁建筑形式,反映出中国南方多水地区帝陵建筑的技术特点。

除三条御河外,孝陵陵宫地下还建有巨大的涵道,以增加雨季的泄洪量。陵宫内侧建有地下排水管道,地面建筑周围均以砖铺设散水和明沟,享殿台基四周向外悬挑一排排精美的散水螭首;宫墙外也以砖铺设散水,以石砌建挡土墙。